

清代宫史探析 下

清代宫史研究会 编

紫禁城出版社



清代宮史研究會 編

清代宮史探析 下

紫禁城出版社

目 录

第八届清宫史研讨会概述 许 静 (1)

清代宫史研究与“e考据时代”

——以西方清代宫史研究为中心 ... 徐 凯 张 婷 (7)

政治·军备

清入关前座次尊卑与宫廷宾礼 王 丽 (16)

清代冠服制度的特点 范 丽 (29)

清代皇帝服饰典制及其他 张 莉 (39)

大白伞盖佛母与皇室信仰 马云华 (54)

论清帝武功良具与骑射尚武精神 毛宪民 (69)

谈清帝大阅及大阅棉甲 李兴华 (85)

康熙帝与清代武备 曹连明 (96)

康熙帝上陵述评 张志宏 (106)

“弘皙案”：康熙朝晚期争储之余波 韩春艳 (117)

关于“雍亲王遗年羹尧谕”的再认识 王光越 (127)

《狩猎图》与木兰围场 杜红雨 (138)

雍正中辍北巡与乾隆再行北巡原因考识

——兼议康、乾、嘉三帝北巡得失 … 刘玉文 刘 玮 (148)

康乾盛世形成中的文化

——承德御制碑刻 …………… 张淑敏 (166)

浅谈承德皇家寺庙护法神祇…………… 彭俊波 (178)

从《九日登高作歌》谈乾隆帝的民本思想 … 孙继新 (189)

对乾隆初年修建盛京皇宫的新认识 … 李昊天 白洪希 (197)

清代重臣张廷玉与配享太庙…………… 张凯旋 (207)

嘉庆帝驱逐英使阿美士德述论 …………… 刘兰青 (218)

嘉庆帝与避暑山庄

——从《嘉庆帝巡幸热河起居注》谈起 …… 蒋秀丹 (230)

明清皇帝与张家口…………… 孙召华 (239)

雍和宫始建年代考…………… 郭美兰 (258)

圆明园阿哥弘瞻及其园寝…………… 赵晓菲 (268)

清代东陵奴仆陪葬墓述略…………… 张鹏翔 (276)

略谈孝东陵对清代后陵的影响 …………… 袁树文 (282)

宫廷·生活

试析努尔哈赤时期后妃的生活与文化 …… 王艳春 (289)

清代宫中节令礼仪与膳食 …………… 王 玲 (304)

从档案看紫禁城里的煤炭供应

——以乾隆年间为例 …………… 郭春芳 (322)

论清宫御用药具及药材炮制…………… 恽丽梅 (333)

清宫锭子药述要…………… 关雪玲 (348)

清宫烟花爆竹的管理与使用…………… 葛会英 (362)

“贮水簪群英”

——从清宫插花瓷器看宫廷赏花习俗 …… 刘 伟 (372)

避暑山庄庭院景观与帝后生活	周晓梅 (384)
论乾隆时期避暑山庄内的宫廷娱乐活动	刘慧轩 (393)
清宫主位遗物的分类处理与焚化革新	李 寅 (405)
晚清电报与帝后生活	雁 旭 (412)
清太子宫考	王子林 (425)

宫廷·艺术

与康熙朝御用玻璃厂有关的几位西人	王和平 (443)
盛世制佳器 此物可传情	
——沈阳故宫藏乾隆御制壁瓶、轿瓶	李 理 (454)
乾隆朝铜器制作述略	恽小刚 (471)
从民间到宫廷的紫砂艺术	蔡 毅 (481)
浅谈清宫带有款识的御用丝织品	黄晓萍 (494)
从故宫藏广绣作品谈广绣的基本特征	阮卫萍 (504)
清宫与新疆栽绒毯	刘宝建 (516)
清代宫廷织绣荷包管见	
——兼论清代荷包功能转变及其原因	殷安妮 (524)
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使用紫檀木初探	周京南 (535)
论乾隆皇帝朝服像	李 湜 (553)
论“三宝珠吉祥草”彩画的源流	
——兼谈北京故宫午门彩画	王成民 (564)
清代宫廷画家笔下的皇家园林	赵炳文 (574)
山水相济有度 崇宏典雅并存	
——浅析清西陵的园林艺术	邢宏伟 (583)
“棚”系列烫样所折射出的清代皇家	
生活文化	朱庆征 (594)

教育·典籍

从功课档与《翁同龢日记》谈同治帝的

典学教育 邹爱莲 (604)

清代前期的满文教育与满文出版 章宏伟 (622)

论清高宗对满蒙文词典的敕修及其在语言学方面

的作为 春花 (665)

英和与修官书行迹考略 朱赛虹 (679)

明清内府写本鉴定浅谈 翁连溪 (685)

清宫珍藏的样式雷建筑图档

——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

图档说起 刘若芳 (701)

清宫造办处档案及其编纂 李国荣 (713)

试论皇家藏书楼文津阁无与伦比的

藏书效能 韩利 (726)

后记 (734)

与康熙朝御用玻璃厂有关的 几位西人

王和平

近年来，时有关于康熙朝御用玻璃厂的文章见诸于国内外期刊杂志，其中对纪理安、倪天爵等人曾供职于玻璃厂的记述已基本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对纪理安的玻璃制作技术究竟源于何处却一直未有定论。本文拟通过对所见相关内容的比较试对此问题进行一定的探讨和论证。另外，对过去认为曾在玻璃厂服务过的传教士倪天爵提出质疑，从现存史料分析，应为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陈忠信之误。而真正的倪氏则是擅长天文不谙玻璃术的意大利人，实际上从未进过玻璃厂。

纪理安^①，字云凤，生于德国福尔斯堡（Wurzburg），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科学家。1689年8月20日从德国出发，途经里斯本、果阿、澳门等地，历经航程近5年，于1694年7月与闵明

^① 纪理安（Kilian Stumpf）1694入华，1720年歿于北京，葬于阜成门外栅栏墓地。墓碑现存栅栏。

我^①等人抵达广州。次年应召入京，佐理历政。继闵明我之后，任钦天监监正。1717年，他向教皇呈递了一篇主张保留中国礼仪的辩护疏，因用词激烈，被教廷禁止。教皇11世因此要求将他从中国召回，但教令到达中国前，纪已去世。捷克传教士严嘉乐^②曾这样描述纪理安：他既有全面的理论修养，又精通技术，善于发明。他在中国建立了冶炼厂、铸造厂和玻璃厂（其中建立冶炼厂和铸造厂一说，由于相类资料的匮乏，目前尚难肯定）。关于纪氏在京的活动还有两份来自传教总会（传信部）的虽然简略但却十分重要的资料。一件为罗马教皇派往中国的特使多罗（Tournon）的随员安德里亚·堪德拉（Andrea Candela）写于1710年10月21日，其中记载，法国传教士的教堂旁边是玻璃厂，由纪理安神父负责那里的工作；另一件是一份以纪年为序的名单，记录着传教士的姓名及入华时间，一直记至1727年。关于纪理安一栏中写着他出生在德国福尔斯堡（Wurzburg），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但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在北京建立了一座玻璃厂，并特别请求亲自为皇帝制作玻璃器。戴进贤是曾任钦天监监正的另一位德国传教士（Ignatius Kögler）1717年曾参与了纪理安在玻璃厂的制玻璃事务。言及纪氏的制造术，戴评价说：他精通玻璃制作，所制的玻璃器，造型种类繁多，个个皆拥有优美的色彩，色调怡人。他能把雕刻艺术用于玻璃器并用转轮对其进行抛光处理。这使得纪理安制出的玻璃可很好地适用于天文仪器。另外，他们还目睹了在纪理安的亲自指导下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玻璃作坊。这使得他们大为震惊。在宫中玻璃厂内，纪理安神父还亲自辅导和训练技师，教授制作玻璃和珐琅两种技术，以及如何提高玻璃生产水平。用这种方式，纪理安在宫内培养

① 闵明我（C. F. Grimald），1669年入华，1712年歿于北京，葬于阜成门外栅栏墓地（现北京行政管理学院内），墓碑下落不明。

② 严嘉乐（Karl Slavicek），1716年入华，1735年歿于北京，葬于阜成门外栅栏墓地。墓碑现存。

出了一批天才的满汉技术人才^①。纪理安在1704年1月11日的信中也曾提到他在宫内培养徒弟之事。

关于纪理安的制玻璃术源于何时何处，目前尚未见到直接记载。2003年第一期《故宫博物院院刊》（以下简称《院刊》）中所载译文《清代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中写道：当耶稣会士穆敬远（Joao Mourao，1700入华，1726年歿于青海西宁）无私地传授纪理安怎样制造玻璃以及怎样添加珐琅颜色，纪理安将之传入中国，然后中国的宫廷玻璃作坊里使用这种装饰风格的技术就毫不奇怪了^②。这一内容从该译文的注解中我们得知是来自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档案，可以说资料来源应比较可靠，但仔细推敲起来，却有些费解。如果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曾经教授过纪理安制玻璃术，应该是在纪理安入华之前，也就是1694年之前，穆敬远为葡萄牙籍传教士，在有关穆敬远的记载中，尚未见到他有到过德国的经历，并且与纪理安有过交往。另外，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同样对此结论有些怀疑。如果穆会制玻璃，甚至高于纪理安，那么，穆在1700年入华并进入宫廷时，玻璃厂已成立，而且非常需要制玻璃的人才（为此，传教士被派往欧洲征聘或写信要求将会此类技艺的人才派往北京），康熙帝没有理由不让他进入玻璃厂协助纪理安。穆在宫中因中文好深得康熙帝宠爱，“朝中大臣争与交游。敬远任皇帝译员数年，曾数次随驾巡行塞外”^③。康熙甚至曾就确立皇太子一事征求过穆敬远的意见，足见其对穆氏的信任。穆如果真会制作玻璃，不会不向皇帝提起。因此，笔者认为，

① 参见艾米莉《康熙皇帝的玻璃厂》一文（The Kangxi Emperor's Glasshouse…… Nella Fornace Di Vetri,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Snuff Bottle Society, Journal · Winter, 1990。

② 艾米莉（美），米辰峰译：《清代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63页，《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1期。

③ 费赖之（法），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568页，中华书局，1995年。

纪理安的玻璃术虽然尚未发现最直接的证明，但来自穆敬远可能几乎不存在。

纪理安的出生地福尔斯堡（Wurzburg），是德国耶稣会势力很强的城市，离盛产玻璃的 Spessart 不远。耶稣会神父中有些便深谙此道。据记载，一位叫鲁道夫（Rudolphus New）的神父曾在 1691 年，也就是与纪理安神父同年向耶稣会提出申请，要求去中国服务，并称自己会制作玻璃，但未获准。纪理安在 1681 年至 1685 年间恰在 Wurzburg 从事神学研究，如果在那儿和鲁道夫有交往（这种可能性很大），就有可能谈及制玻璃术，甚至会一起研究并制作过玻璃。^①

研究中西交流史的德国专家柯闾霓博士曾提供了纪理安来华前的一些信息：纪理安曾做过几个小村子的牧师（神甫），比如黑森林（Black Forest），Spessart 以及 the Steigerwald。这些地区皆有大片的森林，适合建设玻璃厂。如位于 Wurzburg 与 Frankfurt a. Maie 之间的 Spessart，在玻璃发展的鼎盛期那里曾有 50 个玻璃厂（而纪理安恰在 Spessart 做过牧师）。

这些玻璃厂生产的玻璃具有纯净的威尼斯玻璃风格，同时他们也生产珐琅玻璃。另外金刚钻雕刻工艺也是这一地区高度发达的技术，并多用于水晶玻璃。16 世纪晚期，德国制作玻璃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能将精美的画珐琅技艺用于玻璃制作。从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神父 1687 年写信要求从欧洲派遣玻璃和珐琅技师一事也可证明，这两项技术在欧洲已经相当普遍并臻于完美。以纪理安来中国之前在德国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一定对玻璃非常熟悉，参与制作也在情理之中。

通过以上所述及记载，可基本肯定纪理安在来中国之前已经掌

^① 参见《玻璃与康熙皇帝》一文，此文原为笔者为杨伯达先生所译文章，因手中只留有草稿，原作者名已遗失。无法标注准确出处，如今后能查证清楚将作补充说明。

握了制玻璃技术。但在进京之前康熙帝对此并不了解。从 1681 纪理安向教会提出申请，希望前往中国做事到 1689 年得到耶稣会会长 Gonzalez 的批准^①，前后经过整整八年的等待。1694 年，纪理安与从欧洲返回的闵明我同时抵达广州，后又滞留广州达一年之久。而正是在这一年当中，纪理安将闵明我从欧洲带回的已经锈蚀不堪的科学仪器拯救如新。康熙从广州官员的奏折中了解了纪在天文与机械方面的才能，于是，纪理安 1695 年奉诏进京佐理历政。

当时，葡萄牙被罗马教皇任命为东方的保教国，纪理安受罗马教会派遣从里斯本搭船前来中国，却没有按照惯例被分配在属葡萄牙传教士的南堂居住，而是安排在了属于法国传教士的北堂。这表面上看来不合常理的做法，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康熙帝在了解了纪理安的才能后，对其十分欣赏。北堂离大内近在咫尺，纪理安住在北堂，自然方便随时召见。虽然起初纪理安是因天文才能奉诏进京，但很可能在与皇帝的交谈中涉及到了玻璃制作的事，并在得知纪理安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后，便请他主持（主要在技术上）建立了御用玻璃厂。正如洪若翰（Fontaney）1696 年寄往欧洲的信中所说“纪理安神父遵照皇帝的旨意承揽了建玻璃厂的事。”^②

纪理安从进京之始直至去世在宫中行走共计 25 年，为康熙朝的玻璃制作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日记，现存于波兰第斯特尔会图书馆（费赖之《天主教耶稣会士书目》转引维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页 62）。另零散于国外有关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档案及有关资料也可为纪理安在宫中的活动提供比较可靠的资料。耶

① 参见《玻璃与康熙皇帝》一文，此文原为笔者为杨伯达先生所译文章，因手中只留有草稿，原作者名已遗失。无法标注准确出处，如今后能查证清楚将作补充说明。

② 洪若翰信件，藏于罗马教会档案。洪在信中还请求从欧洲选派优秀的能够制作水晶玻璃及画珐琅的匠师来华。参见艾米莉《康熙皇帝的玻璃厂》一文（The Kangxi Emperor's Glasshouse... Nella Fornace Di Vetri,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Snuff Bottle Society, Journal · Winter, 1990.

稣会神父 Francis Rouleau 在其文章中提到有关纪理安的大部分文件存于罗马的耶稣会档案中，虽然这些文件主要是关于教会事物，但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关于其他活动的如为皇帝服务或关于珐琅、鼻烟壶等方面的研究记录。在神父 Reil 的著作中也提到梵蒂冈秘密档案中有与此相关的信件。

前不久，德国中西交流史专家柯兰尼博士来故宫参观，笔者有幸陪同并与她交谈。她对纪理安供职清代皇家玻璃厂这段历史非常关注并一直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中，传教士纪理安占有一定地位。有关纪氏的资料主要存于西方，我们可以期待从这些资料中得到一些有关康熙朝皇家玻璃厂的内容，这对清早期宫廷玻璃的深入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与玻璃厂有关的天主教传教士中，有不少文章提到倪天爵这个名字。并多认为倪氏 1719 年进京。如上述 2003 年第一期《院刊》译文《清代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便采用了这一时间。译文还提到：倪天爵仅在宫中工作了三年，便因健康关系返回了欧洲。返回的时间是 1720 年。时值教皇使臣嘉乐奉命来京觐见康熙皇帝，其随行传教士多马策励便被留下补了倪天爵的缺。^①如果说倪天爵是 1719 年进京，那么三年后的时间应是 1722 年，怎么会是 1720 年呢？倪天爵进京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又在宫中工作了多长时间？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查阅了相关书籍及清史有关档案。费赖之神父编著冯承钧先生所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是研究明清耶稣会士在中国活动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其中有关倪天爵一条中记有：倪天爵，(Jean Baptiste Grave-reau)，1719 年入华。偕安泰修士同莅中国。另耿昇先生所译荣振华编著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一书中，收入了两位

^① 艾米莉(美)，米辰峰译：《清代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 年 1 期，65 页。

名叫倪天爵的人，一位于1716年进京，西文名为 Giampriamo，意大利人，擅天文（这一位倪天爵在费赖之神父的书中被称作喜大教）^①。另一位于1719年入华，西文名为 Jean Baptiste Graveureau，法国人，擅珐琅术。显然，从西文和中文译名以及入华时间来看，后者与费神父所记倪天爵应为同一个人。

关于荣振华所记第一位倪天爵入华的时间，清档案史料可参阅康熙五五年（1716）7月奏折：由大西洋回帆的澳门船只搭载了西洋人三人，一名严嘉乐，38岁，称会天文并会弹琴，一名戴进贤，36岁，称会天文……又有西洋人倪天爵一名，亦称晓得天文，一并由驿送京。康熙五五（1716）年9月28日，又有广东巡抚杨琳奏折中说，西洋人严嘉乐、戴进贤、倪天爵三名，具会天文。广东人潘淳，能烧珐琅物件……今又查有能烧珐琅杨士章一名……于9月26日，西洋人三名、珐琅匠二名、徒弟二名，具随乌林大、李秉忠，启程赴京。从这两条奏折可知第一位倪天爵进京的时间是1716年，其特长为天文，随同擅制珐琅的潘淳^②等人一同进京。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两个倪天爵。分别于1716年及1719年先后入华。可是，在我们读了康熙五十八年的奏折后，或许会产生其他的想法，两广总督杨琳在为奏报续到洋船事一折中记有：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兰西洋船一只，内有法兰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珐琅技艺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

① 此人据费赖之神父记载，1716年—1720年在朝。其西文名与荣振华所记第一位倪天爵西文名字相同，引文所写倪天爵于1720年离开中国的说法不知是否来源于此。但此人离开中国的时间应为1721年2月，时值罗马使臣嘉乐访华，康熙帝委托其将《嘉乐来朝日记》送往罗马，后留居欧洲。

② 关于潘淳，《广州市志》中的工艺美术工业志中曾有所提及：潘淳擅制珐琅，17世纪中后期，广彩大部分有五彩、及黄、粉绿等9种色料，后潘淳研制出了桃红（金红），丰富了珐琅彩的颜色。

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① 应该注意，法国珐琅匠师陈忠信和安泰同船到达，时间是 1719 年。

至此，综合以上诸条资料，可大致记为：于 1716 年入华的 Giampriamo，中文名字分别是倪天爵和喜大教。而于 1719 年入华的 Gravereau，中文名字分别为倪天爵和陈忠信。在有关传教士的很多文章中（西文或中文），凡出现 Gravereau 时，后面几乎皆注为倪天爵。

台湾张临生先生在《清代御制珐琅玻璃器》（英文）一文中写有：1719 年，Jean Baptiste Gravereau 进京，入宫指导珐琅制作。但是张先生在该西文后未注明中文名字。

再有澳门文德泉神父在修正费氏《入华耶稣会士年表》中，虽与费氏一样把 Jean Baptiste Gravereau 排列在 1719 年，但却没有采纳原来费氏所用的中文名字，和他列在一起的是同年入华的安泰，中西文名字皆有。既然是修正列表，那么肯定是费氏列表在先，文氏在后。但为什么文氏在收入 1719 年入华传教士时，保留了原表中安泰的中文名字却略去了 Gravereau 的中文名字倪天爵呢？按照一般规律推测，文神父应该是认为此条中文有误，起码也是表示怀疑。列表没有另外标注中文，可知文氏虽然不认可倪天爵这个名字，但他亦不能肯定该条的中文名应是什么。但从所存清档康熙五十八年杨琳奏折可以知道，1719 年同船到达广东的是安泰和陈忠信，奏文中还注明陈忠信是法国人，擅烧制珐琅。从入华时间及国别的吻合及陈忠信的西文名字一直没有出现的情景分析，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在文氏入华耶稣会士修正年表中与安泰列在一起的 Jean Baptiste Gravereau 这个人，不是倪天爵，而是陈忠信。也就是说，费氏原表中 1719 年入华的 Jean Baptiste Gravereau 所注

^①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四册，23 页，中华书局，2003 年。

中文名倪天爵以及耿昇先生所译《补编》中所列 1719 年入华的倪天爵皆为陈忠信之误。关于倪天爵进京的时间，按照康熙五十五年杨琳奏折所说应在 1716 年，倪氏在宫中深得康熙帝的信任，1721 年，值罗马教皇特使嘉乐来华之际，康熙特委托倪天爵（喜大教）将有关罗马特使嘉乐来华内容的《严嘉乐来朝日记》带赴罗马。^①对于倪氏是否在玻璃厂工作过这个问题，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如上所述，戴进贤曾在 1717 年参与过纪理安玻璃制作事务，并对其在玻璃厂的状况有很清楚的描述。如果当时倪天爵（按奏折讲，当时正是倪天爵在北京的日子）也在玻璃厂，又和戴氏同时进京，戴氏不应该忘记也提上几笔。

陈忠信到达北京后，遵照皇帝旨意，在造办处为宫中培养制造珐琅的人才。关于陈忠信在宫内的活动，法国耶稣会神父冯秉正在 1720 年的信中作了以下叙述：陈忠信进宫后，惊奇地发现皇家作坊制作珐琅的水平几乎和他一样好。以此可以想见，1716 年进京的广东珐琅匠人潘淳等人制作珐琅的技艺应该不错。1716 年奉旨进宫时，潘淳就随身带有珐琅色料及珐琅半成品，越三年，待陈忠信进宫，潘淳等人的珐琅制作工艺定有相当的发展和提高，因此，才会引起陈忠信对宫内珐琅制品制作水平的惊叹。（参见 1718 年康熙御批奏折中：珐琅大内早已造成，各种颜色具已全备……）^②亦可知陈忠信所言不假。

由于健康原因，陈忠信在宫内只服务了三年，于 1722 年 12 月返回法国。

除了纪理安与陈忠信，值得一提的曾在康熙朝玻璃厂供职的第三位外国人是多马策励，1720 随教皇克莱蒙 11 世特使嘉乐进京，因擅画，被皇帝留在宫内，为画珐琅制品设计绘制图案，当时已在

① 顾为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81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年。

② 中仁：《康熙御批》，434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年。

宫内行走的郎世宁在绘画上给了多马策励很多帮助。1724年，奉罗马教廷传信部之命返回欧洲。

康熙一朝，御用玻璃厂还可能有非宗教西方人士的介入。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法国一家中国公司（the *Compagnie de la Chine*）的帮助下，安菲特律号（*Amphitrie*）到达中国，其中三人为法国皇家玻璃厂（*manufacture royale des glaces*）的玻璃技师（*director*）。白晋^①曾鼓励他们大量生产镜子和平板玻璃向中国出口，并建议他们在广州建厂。于是，这家“中国公司”派了8名非宗教玻璃技师来到中国。这些人还负责修整在航行中损坏的玻璃。法国耶稣会把其中两人 Vilette 和 d'andigne 推荐给了康熙皇帝，并至少有一人受雇于造办处。遗憾的是，对于17、18世纪进京的非宗教人士的资料还几乎是空白。布朗（Brown）和 Rabiner 曾在其文章中提到，关于更早一些对中国玻璃制造方面有所贡献的欧洲人，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t 1744年入华 1774年在北京去世）在1773年做了以下记载，有一位非宗教玻璃匠曾为康熙皇帝工作了多年。蒋友仁也是法国人，他提到的这位法国玻璃匠和上面所说由白晋推荐给康熙并留在造办处的玻璃匠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晚明至清，是继唐、元之后第三次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时期，以北京为中心，前后绵延200余年。康熙皇帝态度开明，广泛吸取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并为当朝所用，使其成为与西人全方位接触最多的清代皇帝。先后有数十位西方传教士服务于宫廷。造办处更是西方人才聚集的地方；然由于康熙朝造办处档案的短缺，加之现存康熙朝玻璃实物的稀少，给康熙朝御用玻璃的研究带来一定困难，但同时也给未来这一阶段的研究留有较大的空间。随着国内、外相关文献和历史资料的不断出版，以及康熙朝玻璃实物的渐次发现，定会

^① 白晋（Joachim Bonvet），1687年入华，1730年歿于北京，葬于北京城外正福寺墓地。

使清宫史中这一段本应十分辉煌的历史日益明晰。

限于篇幅，有关康熙朝御用玻璃厂的其他问题将另文探讨。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